

永恒的思考

黄剑平 著

下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永恒的思考

黄剑平 著

(下)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走向“喜剧”的跋涉

“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喜剧。”（马克思语）

“假如呼伦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闹市”，大兴安岭就是“幽静的后院”。“假如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呼伦贝尔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翦伯赞语）“后院”幽静，“后台”萧索，都不会有“喜剧”发生。那么，人口爆炸，生存危机，农业开发，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现实背景的转换，会不会促使“最后一个阶段”归属“后院”和“后台”，从而加速这里的“喜剧”的进程？

我走向了呼伦贝尔怀抱中的海拉尔垦区。



呼伦贝尔，地处北中国“漠北”之东北，远离长城，远离中原，远离沿海，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代，近代，现代，在内地人眼中，这里始终是祖国版图上一块遥远

而原始的土地。

也许是因为这里有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草原，也许是因为这里有烟波浩淼的大兴安岭林海，也许是因为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游牧和渔猎为主的地方，也许是因为这里的生产方针曾经或仍然“林牧为主”，上世纪中叶开发于此的海拉尔垦区，50年的发展历程从来都绕不开一个敏感话题：（1950年代）垦荒种地与保护环境、发展林牧的利弊得失。

毫无疑问，同邻近的黑龙江垦区和遥远的新疆、海南、云南垦区一样，海拉尔垦区充满着浓郁的时代色彩。1950年代末期，刚刚结束内外战争的中国大陆百废待兴，6亿4千多万人口要吃饭，穿衣，国家没有能力进口粮棉，国民更没有能力购买进口粮棉，一切全靠自力更生（值得参考的是，2004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46亿4千万美元，主要原因是粮食出口大幅度下降，进口大幅度上升），而当时，农业单产和总产都在相当低的水平上。经济落后，人口众多，不控制人口增长，反而提倡人口增长。“人多力量大，热情高，干劲足”，成为当时非常响亮的口号。有识之士提出的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的建议，理所当然地遭到高层反对。提出建议的人士被革职、批判。在农业生产方式极度落后、国民生存问题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却为人口的恶性膨胀沾沾自喜的国家，难道还会为了保持自然界的原生态而让大面积宜农荒原继续沉睡下去吗？更何况，“地能尽其力则民食足”（孙中山语），从开发的角度解决贫困问题，历来都是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为一切有识之士在不断丰富内涵的过程中推而

广之。

如果说人口、资源、环境三条曲线互为关联，那么，人口曲线是因，资源和环境曲线是果；人口曲线不断上升，必然导致资源和环境曲线不断下降；资源和环境曲线不断下降，必然导致生存质量趋向于零。这是自然界对人类无序发展的永久性制衡。没有人，亦没有力量，更没有可能消除这种制衡。这是否说明，人类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总量日趋减少和环境条件日益变异？事实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人因为保护资源和环境而阻止得了人类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欲望。这是否又在说明，凡是有人类存在和居住的地方，资源和环境就要在发展中保护？

手头有限的史料告诉我，呼伦贝尔农业开发，远不止上世纪中叶，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即有人垦荒耕作（“完工墓葬”等考古资料已经证实）。1181年（大定二十一年）重新修筑“金界壕”以后，现阿荣旗一带已经有戍边军民屯田。1732年（雍正十年），清政府开始在扎罗木得一带种地筑城。1733年，清政府派304名水手及驿站闲散壮丁赴伊敏河、格尼河耕种地亩。1737年（乾隆二年），额尔图将军上奏清廷：“兴安山岭之阳鄂木博齐及雅尔和鼎等处，地势宽平，水草肥美，既可屯驻，兼宜耕种。若移居其地，每年往呼伦贝尔更番驻防甚便。”清廷总理事务大臣议准：“请以三千兵丁之妻子，尽移鄂木博齐等处居住耕种。”（《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P317）到了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清政府更加重视呼伦贝尔农业生产，应黑龙江将军绰

勒多的奏请，对“安插呼伦贝尔地方之杜尔伯特台吉班珠尔、布图库，噶勒杂特之得木齐根敦、达木拜，明噶特之巴苏台等一百四十七户”，“每二户，合给农器价银一两，麦种一石，耕牛一头，每一头折银八两，令其耕种，以资养赡”。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政府又选派塔哩雅沁降回百人并家口二百余，一同送往呼伦贝尔地方耕种（《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P465）。乾隆四十五年（1780），布特哈播种雍正时之垦地31770垧（《八旗通志》卷七十三及《盛京通志》卷二十四）。

呼伦贝尔更大面积的农业开发，是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1949年，内蒙古自治区调拨60亿元（折合现人民币60万元）开垦阿荣旗荒地。到1955年，索伦旗（现鄂温克旗）、陈巴尔虎旗、额尔古纳旗（现额尔古纳市和根河市）、喜桂图旗（现牙克石市）、布特哈旗（现扎兰屯市）、阿荣旗、突泉县、海拉尔市等地已建有23处国营农牧场。1955年12月元日成立的呼伦贝尔盟国营农牧场管理局（现海拉尔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即辖这些农、牧场。“三年自然灾害”结束时（1961年末），垦区耕地面积已经扩大到454万亩。

不厌其烦地陈述这些史实，无非在说明，海拉尔垦区所垦荒原，既是历史垦荒的延续，又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大跃进”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将近2000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1990年出版的统计资料推算）。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因饥谨而“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作者，曹树基（《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接近二战期间（世界）8000万死亡者【《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学习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论述》，作者，吴建民（《求是》2004年第15期）】的一半，八年抗战（中国）3500万死亡者【《国民党：1937——惨烈悲壮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者，苏冀鲁（国防大学出版社）】的总量。尽管如此，有人在评价那段历史时还是认为，在呼伦贝尔创办垦区是决策性错误。持此认识者，一个鲜明的观点就是呼伦贝尔宜种草养畜、植树育林，不宜开荒种地、进山伐木。他们的最有力的论据就是1998年特大洪水。他们把灾害的成因归咎于荒原的开垦和森林的采伐。开垦荒原、采伐森林，影响环境，不容否认。但是，历史上水草丰美的新巴尔虎右旗没有荒原的开垦和森林的采伐（那里没有森林），全旗25000平方公里地域，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1.38人（按2003年人口计算），为什么却成为呼伦贝尔沙化最严重的草原，1998年同样遭受特大洪水的侵袭？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海拉尔区曾林木葱茏，没有林业职工进驻，包括郊区在内，迄今还不到30万人口，为什么城区不见一棵参天古树（连一棵50年的大树都没有，更不要说像长春、包头那样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景色了），城郊不见一片挺拔森林（西山樟子松林作为国宝进行保护，当属例外，但破坏得也很严重。而东山，种植了几十年树，破坏了几十年树，砍伐了几十年树。呜呼，哀哉），狂风肆虐四野，黄沙兵临城下？

海拉尔垦区拓荒播种（其中岭西 370 万亩，岭东 80 万亩）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拓荒播种是否就是破坏环境？如是，普天之下，哪一亩耕地当初不是“环境”？依此理论，拓荒者就是破坏者。这样把破坏环境的帽子扣在拓荒者头上，海拉尔垦区的转业官兵落泪，黑龙江垦区的转业官兵落泪，新疆、云南、海南垦区的转业官兵同样落泪。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因为没有饭吃而永远倒下的数以千万计的同胞的死告诉他们，20 世纪在全国流通了四十来年的粮票、布票、棉票（粮票只有持城市粮本才能换取），以及各地凭户口定量供应的粮、油，凭小票定量供应的肉（油和肉也只有城市居民才有资格得到供应）告诉他们，对那一个时期垦荒种地发展农业保障供给的认识，怎么可以抛开国情，抛开数以亿计的国人的生死存亡于不顾，用今天的标准论昨天的是非，作昨天的结论！

1990 年，我在《构造一个新的生态》一文中说：无论从宇宙变化的角度还是从人类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原生态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如何在人类发展当中构造一个更适于生产和生活的新生态，是一切文明社会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单纯为了保护环境而强调对所有原生态一无所动，那是消极的环境主义者的认识论。单纯为了开发建设而强调对所有原生态进行改造，那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者的认识论。一方面，不受眼前利益驱使，积极保护不宜开发的原生态，一方面，在建设中构造新生态，在发展中保护原生态，这才是环境保护的至高境界。

新巴尔虎右旗和海拉尔区乃至其他许多地方的环境恶化，既是对原生态严重破坏的下场，更是对新生态缺少保护的结果。而这一切，均是因为人，人的眼光，人的能力。启示发人深思：越是经济贫穷、科技落后、文明退化的地方，越是吃资源饭。重复上述观点，不是资源饭不能吃。资源者，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之天然来源也。自原始社会至今，凡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包括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的美国、日本、德国……，没有一个地方不吃资源饭。区别仅在于如何吃资源饭？鼠目寸光者，吃资源饭的同时破坏资源；高瞻远瞩者，吃资源饭的同时再造资源。缺少作为者，坐吃资源，竭泽而渔；大有作为者，购进“资源”，卖出产品。在伊敏煤电公司露天煤矿，我看到这样的情景：原煤开采出来以后，挖出的土回填到采区，再种上草籽，恢复植被。而在城区和城区附近的山野，则大面积绿化。一个过去不见林地的地方，如今生机盎然，成为一块绿洲。伊敏煤电公司大手笔描绘“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蓝图，打破了“呼伦贝尔草原不能种树”的神话，树立了开发资源再造资源的样板。

虽然海拉尔垦区没有像伊敏煤电公司那样绿化家园，但是，呼伦贝尔业已形成规模的农田防护林只有在垦区（包括大兴安岭垦区）尤其是岭西垦区才能看到。27 万亩人工林带，像是昂然挺立的守护神守卫着大兴安岭东西 400 多万亩广袤田野。整整半个世纪了，在呼伦贝尔草原，在大兴安岭林海，出现沙化的地方没有垦区的耕地，沙化严重的地方没有垦区的耕地。垦区，不是用每年盛产的 5 亿公斤粮食和出

栏的42万头（只）牲畜，而是用黑油油、绿莹莹的田野昭示世人，拓荒土地的是一代人，保护环境的则是两代人、三代人、无数代人。拓荒者的昨天无愧于历史、耕耘者的今天无愧于历史，他们的明天也一定传承文明，无愧于历史。

二

50年了。

屯垦戍边“大闹三河道”的艰苦岁月已经成为历史，无数拓荒者的青春年华无私地献给了海拉尔垦区的黑土地，生命的最后连同骨灰也埋葬在了这块黑土地。今天，当一个个、一伙伙衣食无忧的人们酒足饭饱以后跑到浴场洗浴、大厅足疗、氧吧吸氧、歌厅练歌、包间健身、牌室玩牌的时候，究竟有多少人还记得那段悠悠岁月以及在那段悠悠岁月中露宿风餐、艰难跋涉的拓荒者的名字，哪怕他们当中一个两个人的名字。

落笔此文，正值 CCTV——8 黄金时段播出电视连续剧《破天荒》。《破天荒》描写的岁月，也是海拉尔垦区拓荒者经历的岁月。《破天荒》中的每一个人物，包括贾述生、高大喜、席皮、李开夫，也包括魏晓兰，方春，何尝不是海拉尔垦区建设过程中曾经存在而且仍然存在的人物。一位“大闹三河道”的拓荒者回忆说，拉布大林农场建场伊始，397头牛和几间早已失修、快要倒塌的破牛棚是花木兰生产队的主要财产。栗桂兰带领35名职工就住在这个牛棚里。和她们

共居一室的，还有瘦弱的大牛和幼小的犊牛（《呼伦贝尔农垦志》P740）。当时，不仅花木兰生产队的拓荒者，海拉尔垦区几乎所有拓荒者都有这样的经历。《破天荒》中北大荒的拓荒者有电灯、电话，办公桌铺军用毯，床上铺军用被褥。相比之下，三河道上的拓荒者远没有那么“奢侈”。

乔杰林在回忆 1958 年 8 月中央农垦部部长王震视察呼盟国营农牧场建场情景时写下一段简短的文字：

当时，海拉尔至三河的公路两侧建了 11 个农牧场，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大闹三河道”。建场指挥部设在哈达图，离海拉尔市 51 公里。条件非常艰苦，搭了几顶帐篷和几个蒙古包。（《呼伦贝尔农垦志》P738）

几顶帐篷，几个蒙古包，组成一个指挥部。指挥 11 个农牧场的建设。指挥部尚且如此，一线建设大军的条件可想而知。请看乔杰林的另一段回忆文字：

工人们听说王部长就住在附近的蒙古包里，有的下班后脸也不洗，水也不喝，拥在蒙古包门前要见见这位革命的老功臣。王部长笑着与大家点头致意。然后对我们说：“咱们跟大家开个座谈会，好不好？”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好！”

指挥部没有大房子，我们感到很为难。

王部长看出了这一点，他起身走到草地上，盘腿席地而坐。职工们也团团围在王部长身旁。

一位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功名赫赫的将军，共和国的部长，下基层住蒙古包过宿，同拓荒者在草地上盘腿而坐开座谈会——四十几年了，该蒸发的都蒸发了，曾经有过的粉饰也“尘埃落定”了，还能找出什么激扬文字比这件事情本身更让人感受到“大闹三河道”的一代农垦人栉风沐雨、寝苦枕块的生活和不屈不挠、昂扬向上的精神呢！

没有！没有！面对那一群英雄儿女苍天作被，荒原当床的创业历程，只有如实的陈述才掷地有声，任何修饰性文字都画蛇添足。

1958年，一位叫刘凤亭的青年，从承德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后到呼伦贝尔盟国营牧场管理局（后更名为呼伦贝尔盟国营农牧场管理局、海拉尔国营农牧场管理局）报到，第二天便离开海拉尔去苏沁牧场上班。海拉尔至苏沁200公里，他坐卡车行驶了整整一天一夜，然后又坐马拉四轮车走了三十来公里。在苏沁，伴他度过第一个夜晚的是一件皮“大哈”和一张办公桌。而在七卡生产队，等待他的则是柳条骨架、里外抹泥，夏天蚊蠓叮咬，冬天寒风刺骨，连蒙古包和帐篷都不如的简易房（《呼伦贝尔农垦志》P744——745）。其实，这仅是一个人“大闹三河道”的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开发建设海拉尔垦区的一代人，哪一位没有这样的

经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在那种特定的环境，既然来到垦区，成为垦区一员，就要过垦区生活，别无选择。

1950 和 1960 年代的农垦人，尤其从部队转业农垦人，刚刚从战争的硝烟中走过，每当遇到困难、遭受挫折，都会想到永远长眠在地下的战友。在他们心中，自己永远是这个世界上的“幸存者”；脚下的路，与其说是自己的路，不如说是牺牲的战友向往而未踏上之路；一个人，可以愧对很多人，唯独不能愧对一个战壕里并肩战斗的战友；可以不做好很多事业，唯独不能不做好牺牲的战友未竟的事业。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士，姓郝，名武汉，1958 年退伍后，到谢尔塔拉种牛场任犏牛饲养员，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多年，他饲养 2230 多头犏牛，只死了 4 头。这二十多年，他的家庭成员由 2 口增加到 10 口（包括父母和投奔他的亲属），可他始终住在建场初期两间低矮、破旧的土屋。这两间土屋，既是卧室和厨房，还是初生牛犏的棚圈（《呼伦贝尔农垦志》P765——766）。1982 年，我到呼伦贝尔日报社工作不久就听说郝武汉。后来，经常有人提到郝武汉，刘凤亭、高原太、陶克、曹育民、杨阿麟、张小弟、嘎日迪、范红旗等海拉尔垦区的几任领导都在不同场合讲到他。可惜，听说而已，一直无缘相见，所以也就无从问起，他不讲条件，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工作，是受到了什么精神力量的鞭策和鼓舞？但是，想象得到。

.....

历史的列车满载着数以万计的转业官兵和天南海北的建

设者驶向边陲黑龙江、新疆等垦区的同时，也载着数以千计的优秀儿女驶向边陲呼伦贝尔的海拉尔垦区。同所有垦区拓荒者一样，海拉尔垦区拓荒者在一片片处女地上播种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播种，就是要收获。但不是所有的播种都有一样的收获。有人说这是地区差异，有人说这是环境差异，有人说这是条件差异，有人说这是思想差异。无论属于哪一种差异，有一点当是共性：越是存在差异的地方，越是需要付出。

1983年，我第一次踏上三河道，第一次走进海拉尔农垦人行列的时候，尽管农场、生产队办公室和学校校舍及部分职工宿舍已经红砖黄瓦，可那一幢幢低矮破旧的板夹泥小房仍然保留着1950至1960年代“先生产，后生活”的“胎记”。那是先前在黑龙江垦区已经难以找到，此后在新疆垦区也没有发现的“胎记”。而1970年代黑龙江垦区各农场普遍拥有的办公楼，未来二十几年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海拉尔垦区才开始出现。不是海拉尔垦区缺少贾述生那样的干才，李仕臣、王玉莲、栗桂兰、鲁凤兰、郝武汉、苗春荣、刘志民、韩立荣、杨秀凤……，一个个、一群群，都是这块黑土地上的“拼命三郎”。在利润全部上缴国家，资金全靠国家投放的计划经济时代，比起黑龙江垦区，海拉尔垦区不但资金投放“先天不足”，而且无霜期只有100—120天（大兴安岭以东）和90—100天（大兴安岭以西）。如此不被“先天”关爱之地，最终的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后天”。遗憾的是，“后天”也和“先天”一样，充满着多少黑龙江垦区没有的

“纠葛”。好比做文章，形势要求做，条件允许做，决策一定做。摆好了笔、铺好了纸、研好了墨，作者思考着、书写着，可是，身旁总有人怒目而视并大声嚷嚷，“×××！”“×××！”让人耳朵不得宁静，头脑不得清醒，精力不得集中。甚至不得不提防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飞过来的让人抬不起头的高帽。我无法知道，如此嘈杂、险峻的环境能不能做文章？能做好什么文章？

无意寻找更多拓荒者的足迹，海拉尔垦区每一块黑土地上都矗立着他们的丰碑。只是遥想，当年，如果没有农垦人拓荒，呼伦贝尔的原生态是否还是莽莽荒原？开垦的黑土地和没有开垦的莽莽荒原究竟何者更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须？莽莽荒原由农垦人科学开垦和由当地居民无序开垦会是怎样不同的结果？还有，如果现在农业生产还像1950和1960年代那样没有化肥和农药的使用（这个假设不是没有必要，有机农业正在成为世界农业的发展方向），呼伦贝尔的粮食产量是否能达到19亿多公斤（2004年）？全国的粮食产量是否能达到4695亿公斤（2004年）？呼伦贝尔270万人口和全国13亿人口是否都有饭吃、有衣穿？没人给我答案，在海拉尔东山一片片沙化的耕地上找到答案，在岭东水土流失的坡地上找到答案，在巴尔虎和鄂温克草原低矮的小麦田、油菜田、葵花田中找到答案，在大兴安岭东西的贫困户家中找到答案。而在海拉尔垦区151公斤（2004年）的平均单产中，看到的则是另一种意义的答案。真正的拓荒者，不仅是建设者，而且是保护者。只有那些追求个人收益，为了个人收益不择手

段、不顾后果的“拓荒者”，才是破坏者。而那些为追求个人收益的人们提供方便并从中牟利的“权势者”，则是最大的破坏者。

三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当全国仅有、设计上以原材料直接生产麦淇淋和批量生产低芥酸菜籽油、低毒菜籽油的海拉尔麦淇淋厂矗立在海拉尔东山，成为海拉尔工业企业第一利润大户的时候，当哈达图牧场几十幢二层小楼的职工别墅在人们不经意间就矗立在老三河道，成为方圆数百里一颗颗耀眼新星的时候，当一个个家庭农场遍布垦区各地，播种者第一次拿着属于自己的大把钞票进行再生产的时候，当海拉尔农牧场管理局植保公司几名技术推广人员白手起家，用他们优良的技术服务赢得广大农垦职工和周边农民朋友的信赖，一年创下近200万元高额利润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宣布：市场经济有别于计划经济的标志，在海拉尔垦区出现了。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最大差异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与消费完全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指令性计划，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与消费则完全依靠生产者与消费者对市场的驾驭和把握。市场，既是每一个生产者的生产空间，同时也是包括生产者在内的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空间。从部队、学校投身垦区，几十年艰苦创业，现在已经离、退的第一代农垦人想象不到，甚至很多正在岗位上的第二代、第三代农垦

人也想象不到，由于市场的作用，21世纪刚刚过去三个年头，2万6千多名农垦职工的身份就由俯仰由人、身不由己的“国有”一下子转换为独立自主、自食其力的“民有”。有人说，这是进入市场经济的通行证。也有人说，这是现在与过去比较管理体制上的质的变化。还有人说，这是每一名农垦人走向自我，真正凭能力吃饭的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历史进步的必然。1949至1955年，中国所有制形式由个体、民营、国有多种成分并存，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国有、集体相对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最终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俗称“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人们戏称这一模式：“是军队没军费，是企业办社会，是政府还纳税，是农民人工会。”可悲的是，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都认为极度落后的这一模式，我们竟一直理直气壮地延续到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其间，走过的是弯路，造成的是失误，承担的是损失，留下的是教训，痛心的是愚昧，蒙受的是落后。而垦区为此付出的代价，尤其沉重。

去年冬，我来到改制后的海拉尔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库力分公司（原国营上库力农场）。和我坐在一起的，都是多年的老熟人、老朋友。他们，包括原农场场长和党委书记，已经不再具有国营农场职工的身份，每个人都是现代企业一员——股东或员工了。看上去，这种改变似乎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言谈举止间，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乃至家人的命运同分公司的命运紧紧地联在一起，那是过去任